

關於古文字的研究

趙 誠

從發生學的角度講，只要有了漢字就一定有人研究它。只不過我們祖先沒有留下可靠的文獻，我們無從確定這種研究從甚麼時候開始罷了。目前所能知道的關於文字研究最早的見解，要算《左傳》那三處解釋漢字形體的記錄：“止戈爲武”、“反正爲乏”、“皿虫爲蠱”。類似的記載還見於《韓非子·五蠹》：“自環者謂之私，背私爲公”。很顯然，這一些僅僅是古人就當時通行的漢字所作的表面分析，極不科學，當然談不上是甚麼文字學的研究。

漢代的今文經學家爲了他們解釋經典的需要，即爲了證明自己的正確，對漢字形體進行過解釋。如“馬頭人爲長”、“人持十爲斗”、“士力於乙者爲地”。一望即知這些解說只是就當時通行的隸書的表面結構所作的分析，是很可笑的。晚出的古文經學家劉歆等創立了“六書”說，指導研究古代文字，從形、音、義三個方面入手，重視分析偏旁，注意同音通假，從此學習和研究古代的文字才有了基本方法。現在學者對“六書”說評價不一，但從歷史看却是一件大事情。劉歆的徒孫許慎作《說文解字》就是在“六書”說的基礎上編寫成的，爲後代學者研究古漢字提供了一套理論和相當寶貴的材料。

到了唐代，李陽冰對傳鈔本《說文解字》進行過刊正，雖然是基於書法，到底是作了一些工作，總應該算是一樁好事。不可諱言，他在刊正中出了一些錯誤，最突出的是刪去了一些不該刪去的內容，另外也有不少訛誤。所以，南唐的徐鉉、徐鉉二人對李陽冰極不滿意。徐鉉作了一部《說文繫傳》。徐鉉和句中正等人又重新校定了《說文》。不管是李陽冰，還是二徐，或是從書法，或是從讀音、訓詁，對許慎《說文》所做的一些工作，從今天的觀點來看，只能算是古籍整理，根本談不上是研究古文字。

這裏所說的古文字研究，乃是指對古代遺物上保存的古文字材料進行研究考釋，並非指對傳世或通行的文字進行解析或詮釋，就這種意義上來講，到了宋代才有了古文字研究的萌芽。從郭忠恕的《汗簡》到夏竦的《古文四聲韻》，總結了古人，主要是唐代人關於古文字的知識。呂大臨的《考古圖釋文》、王楚的《鐘鼎篆韻》、薛尚功的《廣鐘鼎篆韻》等，考證、辨識了好幾百個古文字，並發現了古文字構形的一些零零星星的規律。因爲宋代學者根本沒有把古文字作爲一種科學研究的對象，把古文字作爲一種成系統的資料，從文字學的角度加以考察、研究；更沒有就古文字的形體，平面地、歷史地研究其構造和規律，從各個方面研究其形、音、義的相互關係，所以只能稱之爲古文字研

究的萌芽。

到了清代，由於地下資料的大量出土，古文字研究才有了長足的發展。所考釋的文字，不僅是銅器銘文、石刻篆文，甚至擴展到陶文、璽文、貨幣文等等各個方面。但是這一些考釋，還沒有脫離金石學的範圍。換一句話說，這一些只是單個文字的考釋，在很大程度上只是解決銘刻、款識方面的問題，即着重於解決金石學的問題。

清代中葉以後，《說文》研究取得了很可觀的成就，有名的段、桂、王、朱四家，尤其是段、王二人，雖非專攻古文字，却從研究《說文》得出了與古文字研究暗合的結論。這種精審卓絕的深入研究，直接影響了古文字研究的發展。頭一部把《說文》和古文字研究結合起來的專門著作，是嚴可均的《說文翼》，可惜稿本至今未得印行。稍後的吳大澂有一部著名的《說文古籀補》，把《說文》研究和古文字考釋相結合，而又側重於古文字探索，確是一部使古文字研究逐步走向獨立的專著。可惜他仍以《說文》為正宗，把古文字僅僅作為《說文》古籀的補充，這就本末倒置了。《說文》的古籀屬於戰國文字，而他所補的倒大多是早於戰國的文字。由此可見古文字在他心目中的地位。這種認識上的局限也影響了他的研究，使他沒有達到應有的高度。

古文字材料的大量出土，古文字考釋和《說文》研究相結合，從資料積累和方法論的探索兩方面為古文字研究的獨立發展提供了很好的條件。其奠基人當推清末的孫詒讓。他的《古籀拾遺》和《古籀餘論》應該說是金文研究方面的高峯。他的《契文舉例》是研究甲骨文字的創始之作。而《名原》則在於探求古文字演變的一般規律。應該說，孫詒讓和以前的學者有着本質上的差別。

孫詒讓之後對古文字研究貢獻較大的有下列數人：

一、羅振玉和王國維。主要貢獻是古文字資料的搜集和出版，並作了必要的考釋。《殷虛書契考釋》和《觀堂古金文考釋》等書下筆謹嚴，不胡說八道。另外，他們利用古文字資料對商周歷史進行考訂，也作出了不少成績。

二、董作賓。他的成績是《甲骨文斷代研究例》，使人研究甲骨文有了發展變化的觀念。

三、郭沫若。他特別注重社會發展和文字的關係，非常強調認字和讀通全文這兩方面的結合。《兩周金文辭大系考釋》於每一篇銘文考釋之中幾乎都有文字考證，但着重點却在通釋銘文。《卜辭通纂》和《殷契粹編》都是選擇比較重要的卜辭加以分類排比考釋，也是為了把認字和讀文結合起來。

四、唐蘭。他繼承並發展了孫詒讓的古文字分析法，提出辨明文字形體的方法有四：比較法、推勘法、偏旁分析法和歷史的考證。另外，他還以甲骨金文作根據，批評許慎的“六書”說而提出古文字構造的“三書”說。

五、于省吾。他考證古文字的特色有三：1.把形體分析、聲韻通假和典籍訓詁緊密結合；2.用地下出土的古文字材料和傳世古籍相印證而以地下材料為主；3.從古文字的現實出發，從分析古文字以考證古文字。而這三者考釋古文字現實中則又是有機地統一在一起。由於這種獨具一格的考釋方法，近三、四十年來他辨識之字最多，無疑是很大的貢獻。

任何一種學科發展到一定階段，即某一學科在研究中取得一定成果以後，爲了總結，也爲了年青一代學習方便，必然產生一些相應的工具書，古文字研究也不例外，如容庚的《金文編》、商承祚的《殷虛文字類編》和《石刻篆文編》、朱芳圃的《甲骨學文字編》、孫海波的《甲骨文編》、羅福頤的《古璽文字徵》等等。這些書在研究中產生，又推進了研究，是學術研究中必不可少的一個方面。從某種意義上來講，工具的改進也是方法改進的一種標誌，當然也是這一學科走向更加科學的一個里程碑。

從孫詒讓以來，古文字研究的方法在逐步改進、完善，並以它取得的成績爭得了在社會科學研究領域裏的一定地位，當然是一種可喜的現象。但是，由於它本身的難度高，而資料又不易獲得，在很長一段時期內，研究者總是寥寥無幾，始終沒有超過一百人。而且大多數是在互不聯繫、互不交流的孤立狀況下摸索、整理、研究。由於沒有這一方面的專業性刊物，有了研究成果，也很難發表。當然更談不上有甚麼機會讓有關的教學研究工作者會聚一堂來討論交流。這就產生了一個極端矛盾的現象：古文字研究具有了發展的內部條件而又不能得到很好的發展。






























長期以來，尤其是一九六六年以來，學校幾乎沒有培養古文字研究方面的專業學生，偶而成長起來的中年人又少得驚人，而他們還要承擔各方面的重任。研究尚且無暇，還談甚麼培養！資料書、工具書多年未曾出版；地下出土的文字資料四處堆積而無人整理；尤其嚴重的是青黃不接、後繼乏人威脅着這一學科的正常發展。

“四人幫”打倒以後，古文字研究獲得了新生並且迅速向前發展。不管是古文字學界的老一輩專家，還是中年的教學研究工作者，他們都爭分奪秒地努力寫作，成績是空前的。比如容庚先生抓緊了《金文編》的修訂增補工作；于省吾先生很快完成了《甲骨文字釋林》的初稿；徐中舒先生帶病考釋新出土的銅器銘文；唐蘭先生同時進行幾方面的研究；商承祚先生積極爲編輯《甲骨文合集》提供新資料；陳邦懷先生擠出可以擠出的時間撰寫札記；羅福頤先生盡快地完成了《漢印文字徵》；胡厚宣先生抓緊編輯《甲骨文合集》；張政烺先生不僅忙於個人撰寫論文，還盡力指導各方面的求教者；馬承源先生爲了編寫《金文選》，走遍山南海北拓印銅器銘文；管燮初先生加緊了《金文語法》的寫作；張頴先生爲編輯《貨幣文編》四處奔走，搜集新出土的各種古代錢幣；朱德熙先生和裘錫圭先生合作撰寫《楚國文字研究》；姚孝遂先生日以繼夜地爲《甲骨文字考釋類編》撰寫案語；李學勤先生一分爲三：到文物局幫助整理帛書，到考古所協助編輯《金文合集》，自己抓緊寫作；馬國權先生利用一切業餘時間編寫《列國文字》……真像一瀉千里的黃河之水，奔騰咆嘯滾滾東流，學術領域裏如此壯觀的景象，多少年來才有此一現。







可是，古文字研究新發展的起點却是難忘的一九七八年。春天，黨中央的一位領導同志針對古文字研究的現實，提出了幾點振奮人心的意見。就在這同一個春天，一些關心古文字研究的單位：吉林大學、中華書局、北京大學、歷史研究所、考古研究所、中山大學、四川大學等，共同醞釀發起成立中國古文字研究會，並由吉林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籌備召開古文字研究學術討論會。由於吉林省委、吉林大學黨委的關懷和支持，吉

林大學於七八年十一月召開了學術討論會，並正式成立了中國古文字研究會。一九七九年十二月，由於廣東省委、中山大學黨委的關懷和支持，中山大學在廣州召開了中國古文字研究會的第二屆學術討論會。一九八〇年，在四川省委、四川大學黨委、四川漢語大字典領導小組的關懷和支持下，四川大學在成都召開了第三屆古文字學術討論會。

這三次討論會討論了很多大家關心的重要問題，如歷組卜辭屬哪一期，《庫方》一五〇六片家族刻辭是真是偽，侯馬盟書的載主是誰，中山王銅器銘文和《牆盤》銘文的性質，古文字形體如何分析，中山王墓出土的是兆域圖還是宮堂圖，周原甲骨的性質和主要內容，曾侯墓主是誰，等等。雖然都還沒有得出一致的看法，但研究深入多了。這些問題太專門，不擬一一介紹，下面只講一個關於古文字性質討論的情況作為例子，說明古文字研究會討論問題的一般情況，看看這種學術討論是如何深入開展的。

古漢字有一個非常明顯的特點，即它的表意性。如刀作, 象刀形；人作, 象側面人形；戈作, 象一種兵器形；日作, 象太陽形；牛作, 象正面看牛頭形；羊作, 象正面看羊頭形；犬作, 象狗形；豕作, 象豬形；目作, 象眼睛。稍為複雜一點的意思，也可以通過形體之間的關係來表現。如刃作, 表示一把刀的刀口；休作, 表示人在樹下休息；見作, 從目從人，表示人用眼睛在看；牧作, 象以手執棍棒一類的東西趕牛，表示放牧之意。人們只要用眼睛一看這些形體，就能領會它所表達的含義。所以，長期以來，古漢字一直被認為是象形文字，是表意文字。從這種觀點出發的優點是研究古漢字時注重形體結構的分析。因此，一些長期混淆的形體才得以分辨，比如原來把、 兩種形體混而為一，均釋為貝字，現在從形體分析才分辨出作 形的才是貝字，作 形的象人心臟的輪廓形，乃是一個心字。又如舊以為、 同字。其實，作 形者其所從之 一長一短、一高一低，乃是廢替的替字，作 者象兩 並立，才是並（并）字。注意形體結構分析，不僅多認識了一些字，改正了過去的一些錯誤，還總結了一些古文字構形的一般規律，如從 從 通用，偏旁中早期的 形後來變成了 形。另一方面，認為古漢字是象形的、表意的，也給研究帶來一些問題。如有人象看圖識字那樣去解釋文字，把 字說成是“如人張雙臂向空中上下倒換着拋擲一對彈丸”，把 字說成是“一個人張雙臂而單腿跳舞”；還有人竟然把古文字都畫成圖來說解。正如有人所指出的那樣，這都在任意猜字，完全失去了科學研究的意義。

一些古文字研究工作者在研究中發現，甲骨文字中有大量的人名、地名、方國名、方位詞、時間詞、干支字、虛字等，全都無形可象，無意可會，只是借用一個現存的形體作為聲音標誌來代表自己。這些並非以形表意的字佔已識甲骨文字的百分之九十以上。所以，這些同志認為：“古代漢字，就其文字符號的來源說，也就是從其構形原則來說，它是從象形符號發展而來的。但是，從它的發展階段來說，它已經脫離了表意文字階段，而進入了表音文字的階段。也就是說，這種文字，並不是通過它的符號形體本身來表達概念，而是通過這些文字所代表的語音來表達概念。”所以，“從它的整體來說，從它所處的發展階段來說，只能是表音文字。”這是一個嶄新的觀點。這一論點在第一次討論會（長春會議）提出，而在第二次討論會上（廣州會議）上，展開了長久

的、激烈的爭論、老、中、青一齊上陣，如徐中舒、周祖謨、朱德熙、夏淥、姚孝遂、裘錫圭、林澧等先生，都即席發言，各抒己見，把問題展開了，給人的印象極深。會後幾個月還不斷有人在反復商討。到了第三次討論會（成都會議）上，另一些古文字研究工作者以甲骨文字為例，提出了甲骨文字二重性的觀點。其基本觀點如下：“文字只是記錄語言的符號，是在有了有聲語言之後才產生的，因此文字就不可避免地受着聲音的制約。也就是說，文字的創造必然是以現實存在的語音為根據，因而任何一種文字都必然是有聲的，這是問題的本質。”當然，甲骨文字也不例外。比如甲骨文心 肺 之心 作 ，是象形。水名之沁 作 ，從水從心。有時也寫作 。心在這裏只表聲音。“語言是先於文字的，也就是說，在沒有象形字  之前就一定有關於心的讀音，心可以用來指沁水即其明證。可見，象形字本身也是作為聲符存在於漢語之中的。”又甲骨文字同音字相當普遍，如“甲骨文時期有四個對象（祭奠、人名、地名、甸）是用‘奠’音來表示的，如果要用書寫符號的文字來指稱，用甚麼形體呢？人名無形可象，地名無意可會，甸之義又太抽象，只能在奠祭上打主意。祭奠用酒，所以用了個酒器 。祭奠是敬請鬼神飲酒，需要恭恭敬敬放置在一個地方，所以在酒器下面劃上一個一，於是造成了一個從  從一的會意字。至於奠字的讀音，在造字之前即已存在，奠字一造成，自然和原來的音讀合而為一。”可見，作為人名、地名，或表示祭奠，用作甸，之所以能統一到奠這個字，“並不在於形體，而在於聲音”。這是本質。但是，“甲骨文字的書寫形式照顧了以形表意這一點，使它具有了和一般文字不同的特色”。本質是表音的，特點是表意的，這就是“甲骨文字所具有的二重性”。離開了這一點來看待古漢字都將是不全面的。

關於古漢字性質的討論，雖然尚未取得統一的認識，但問題在逐步深入却相當明顯。從這一點也可以證明，現在有機會在一起討論，比起各自在孤立狀況下研究要先進得多。

近年來，我國開設古文字課的綜合大學日益增多，但還沒有一本理想的教材，更談不上通用教材了。四川、湖北兩省合編的《漢語大字典》決定吸收古文字研究的成果。但如何吸收，還未最後商定。為了教學和現實的需要，古文字研究會第三屆討論會特別就上述兩個方面進行了專題討論。這是古文字研究為現實服務邁出的可喜的一步。

我國從事古文字研究的人員分散，力量薄弱，多年來又遭受到極左路綫的嚴重干擾，這門學科更不景氣。要改變現狀，首先要解決幾個迫切問題：一、創造條件，使現有的古文字研究工作者，尤其是老一輩專家的研究成果能及時發表；二、為了培養接班人，除了老師指導，應盡可能多讓他們有機會獲得各方面的知識、接觸各種條件、了解有關情況。尤其是一些有志於古文字研究的青年，缺乏應有的資料、又苦於無人指導的狀況應予設法改善；三、迅速交流國內外古文字研究的經驗、動態，使古文字研究工作者從相互了解中得到啟發，免掉不必要的重複，以便更好地發揮自己的長處，逐步繁榮這一學科。這就需要創辦一個有關古文字研究的專業性刊物。為此，中華書局決定編輯出版一種不定期的《古文字研究》以滿足學術界的需要。

為了辦好這一刊物，在吉林大學召開的古文字學術討論會期間，曾就《古文字研

究》的編輯方針作過專題討論，大家一致認為：一、《古文字研究》以繁榮社會主義學術文化為目的，發表的文章不宜拘於一格，更不應該人為地製造某一種模式，讓作者去硬套。這才能求得內容豐富多采，形式上的多樣化，顯得生動活潑。二、任何一門學科能夠得到長足的發展，一個很主要的條件就是各種流派、各種學說之間能夠在平等的地位上開誠佈公地進行討論、長時期地進行充分地磋商。因為有些真理是由爭論確立的。要做好這一點，必須堅決貫徹“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方針，對於各種學派、不同論點的文章同等重視。作為一個學術刊物，只要言之有理、持之有故，即使兩篇文章的結論完全相反，也可以同時發表。三、《古文字研究》在某種意義上應是古文字研究會的會刊。這樣做，從某種意義上來說，能夠促進古文字研究學術討論會的質量逐步提高。但是，又不能只作為研究會的會刊。因而，不問是否參加討論會，只要與古文字研究有關，不管是論文、札記、考釋、資料、基礎知識介紹，或是消息、書評、國外研究成果的綜述、譯文，乃至古文字教學經驗、研究計劃等等，如有一定水平，具備一定參考價值，均應刊載。這樣做，有利於更廣泛地團結各方面的教學研究工作者，使古文字研究這門學科得以更好地發展。以上這三點應該是《古文字研究》的編輯方向。中華書局的編輯人員太少，編輯這一刊物總共只能投入四分之一個編輯力量。但是，由於古文字研究工作者們的熱情關注和大力支持，這個刊物在一年多一點的時間裏竟然已發稿五輯。現在，第一輯已出版；第二、第三兩輯正在裝訂；第四、第五兩輯正在印刷。估計今後每年可發稿二至三輯。從這一點也可以感到古文字學界團結向前的氣氛相當濃厚。而這也是古文字研究興旺發達的一個標誌。

古文字研究領域裏嚴重的青黃不接、後繼乏人的情況，已引起各方面的重視。一九七八年以來，全國有條件的單位在上級黨委的支持下紛紛成立了有關的研究室。原來只有中山大學有一個古文字研究室，現在，吉林大學、四川大學都成立了古文字研究室，另外，歷史研究所和國家文物局成立的古文獻研究室，着重整理地下出土文獻，實際上也相當於古文字研究室。此外，與古文字研究有關的還有考古研究所 甲骨文組、金文組，歷史研究所的甲骨文合集編輯組，故宮博物院的金石組，北京圖書館的金石組。這些研究單位，近幾年來做了大量工作，比如歷史所編輯的《甲骨文合集》圖版部分已完成八冊（全書圖版共十三冊）；考古所完成了《小屯南地甲骨》圖版兩冊，並已着手編輯《金文合集》；吉林大學于省吾先生主編的《甲骨文字考釋類編》已完成初稿；四川大學徐中舒先生正指導學生在編寫《甲骨文字典》；中山大學已着手編輯《金文辭綜類》；國家文物局正在加緊帛書和漢簡的整理工作；吉林大學和中山大學合作整理的一批漢簡已完成初稿。可以想見，這大量的成品和即將完成的作品將培養一大批中年和青年研究工作者。除了在工作中培養，有關單位還招收了一些研究生，如吉林大學、中山大學、四川大學、北京大學和中國社會科學院。還有一些高等院校為了本地區本單位教學、研究工作的需要，也適當地招收了一些研究生。這些研究生的總人數雖然不到五十，但在寥寥無幾的古文字學界却是一股強大的生力軍。為了給有關高等學校培養師資，吉林大學和中山大學還接收教育部的委托開辦了進修班。此外，一些熱心於古文字

研究的青年也在各自的崗位上，利用業餘時間，爭取老師指導，努力自學進修。有的地區，如上海市的一些青年們還自動組織起來成立了上海青年古文字學社，並自己捐款，自刻自印，出版了一本《古文字》不定期刊物。這是一種多麼可喜的景象啊！

古文字研究這塊半荒蕪的田園裏，雖然還存在相當嚴重的不足之處，但是只有四年的恢復中，竟然有了如此巨大的變化和發展，離開那百花滿園的春天還會有多麼遠呢？我們相信，全國古文字教學研究工作者必將在黨中央發展科學文化的號召下全力以赴，團結一致，作出更大的貢獻！